

- [4] LI S, SEALE C. Managing criticism in Ph. D. supervision: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7, 32(4): 511-526.
- [5] 任婷, 秦静. 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分析[J]. 世界教育信息, 2012(2): 52-55.
- [6] OVERALL N C, DEANE K L, PETERSON E R. Promoting doctoral students' research self-efficacy: combining academic guidance with autonomy support[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1, 30(6): 791-805.
- [7] PAGLIS L L, GREEN S G, BAUER T N. Does adviser mentoring add valu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ntoring and doctoral student outcome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47(4): 451-476.
- [8] IVES G, ROWLEY G. Supervisor selection or allocation and continuity of supervision: Ph. D. students' progress and outcome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5, 30(5): 535-555.
- [9] PASCARELLA E T. Student-faculty informal contact and college outcomes[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0, 50(4): 545-595.
- [10] PASCARELLA E T, TERENCE P T.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vol2: a third decade of research[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05: 155-445.
- [11] GOETHALS G. Divers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 George Goethals: Williams College, 1999: 1-29.
- [12] WILLIAMS G C, ZIMMERMAN D J. Peer effects in higher education[J]. Williams project on the econo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2003, 39(2): 418.
- [13] WEIDMAN J C, STEIN E L. Socializ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to academic norm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3, 44(6): 641-656.
- [14] ANDERSON B, CUTRIGHT M, ANDERSON S. Academic involvement in doctoral education: predictive value of faculty mentorship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 on doctoral education outco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octoral studies, 2013(8): 195-201.
- [15] 李永刚. 成为研究者: 理科博士生素养与能力的形成[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 [16] 张祥兰, 王秋丽, 林莉萍. 影响博士生科研能力培养的课程因素调查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5): 6-9.
- [17] 戈尔德, 沃克. 重塑博士教育的未来: 卡内基博士生调查文集[M]. 刘俭,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2.

(责任编辑 周玉清)

DOI: 10.16750/j.adge.2020.03.010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

——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综述

付鸿飞 李明磊

摘要: 2019年10月9日, 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教育教育质量提升、博士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评价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通过本次会议, 与会代表对“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21世纪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研究生教育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这有利于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世界范围内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 研究生教育质量; 博士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学

作者简介: 付鸿飞,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081; 李明磊,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北京100081。

2019年10月9日至10日, 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剑桥大学主办,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协办的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代表260余人参会。大会的主题为“‘双一流’建设及世界研究生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与会代表围绕研究生教育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21世纪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研究生教育评价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一、“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程。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推进高校和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国家整体教育发展水平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自启动以来，“双一流”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加快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在“双一流”建设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如，“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双一流”建设中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是什么？

1. “双一流”建设的路线图与上行式评价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院士指出，与经济和高新技术发展相比，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周期较长，成长速度和能力提升相对较慢。我国一流大学可能较晚才能引领世界，但一旦引领，将长期持续。随后，杨卫院士从遴选、目标和维度三个方面对我国“双一流”建设进行剖析，我国遴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客观数据辅助下的专家投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专家认同规则下的客观评价。杨卫院士认为在“双一流”建设中要采用上行式的评价方法，即为一种滚动的、不断往上的评价模式。杨院士提出用“特征学、动力学、统计学、生态学、教育学、哲学”来描绘“双一流”建设的路线图并对其进行评估。在特征学阶段，主要包括学科特色、文化特色、宣教特色、统计特色、领域特色五个维度，各个大学需要凝练学科优势，从实际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特点与能力制定大学建设总体目标，在特色中争创一流；动力学方面，主要是选取一些典型的、世界公认的指标，呈现出清晰的动力学上升态势，包括教育、学术、资源和排名；统计学方面，主要是从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方面进行评价；生态学阶段不仅仅看相关的量化数据，

还要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具有长期保持一流的能力、具有健康的学术生态，不再追求各种排名；从教育学角度出发，一流大学的建设应该是有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可培养一流的师资、可孕育学术界的新学派、形成新的大学教育理念——成为全球教育中心，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从哲学的角度看，“真、善、美”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最高层次，“真”即成为全球的知识宝库，“善”即造就各学科、行业的规范指南，“美”即大师云集、大道至简、大音无声、大象无形。

2. 研究生教育是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

研究生教育是培育高素质人才和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渠道，是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基础。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其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科学研究的成果。打造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既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要的建设内容，也是一流大学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重要标志，更是高等院校承担人才培养使命，服务国家事业的应有之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须把研究生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要进行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深化内涵式发展。

二、21世纪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当前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素质卓越人才的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教育的

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如何适应新形势、新趋势、新变化,抓住机遇,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新课题。为此,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纷纷推出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1. 博士生教育国际化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不仅使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特征,而且还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各种变革^[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 Richard(Dick) Strugnell 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是博士生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加大,全球留学生人数由 1975 年的 80 万增长到了 2013 年的 410 万,增长了 4 倍多;二是知识的国际流动;三是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合作,包括合作办学、合作研究、技术合作等方面;四是课程的国际性,例如外语教学、国外学科或专业的本土化以及国际和地区研究,等等。Richard(Dick) Strugnell 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博士生教育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博士生教育国际化可以为人才“输入国”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教育国际化的经济价值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化教育的重要驱动逻辑。同时,通过博士生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可以使博士生丰富国际经验、建立国际网络、开展科研合作、发现新的研究契机。但不可否认,博士生教育国际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资金、语言、文化多样性等问题, Richard(Dick) Strugnell 教授主张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合作共享,积极开展校际交往、跨国合作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未来的世界各国将会愈加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将会愈加明显。

2. 博士生培养项目化

来自德国 WZB 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 Marc Torka 教授指出当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项目制开始从影响科研组织转到影响博士生培养,从影响经验丰富的学者转到影响博士生。Marc Torka 教授通过多

案例的研究介绍了博士生教育项目化的内涵、动因以及局限性。他指出项目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项目制的研究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并在 18 世纪达到顶峰。项目制一词将科技政策、资助机构、科研组织、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特定项目的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概念化。在学术界,项目化主要是指将科研进程视为一个项目的制定、评估和执行的过程,要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然后决定对不同的领域采用不同的模式和模型。更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关于项目制的四种代表性概念:一种事先规划研究进度的方法;激发新的想法;事后建构个人成就;提供预先规定的活动包(work package)。这些概念适用于不同学科,涉及具体研究类型的认知属性和社会属性。当然,项目制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预先确定结果的科研项目的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颠倒了研究的时间顺序,科研项目的可预测性和短期导向与学术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科研应该是开放的,如是才能释放研究人员无限的创造力。相反,预先确定的项目只能产出既有的而非创新的、不确定的知识;只能应用既有而非构建新的方法论;只能检验既有假设而非提出新的假设。

3. 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多元化

在知识经济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和技术,研究生教育逐渐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进入中心地位。培养高素质卓越人才,是面向 21 世纪研究生教育的中心任务。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Susan Robertson 教授介绍了 21 世纪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技术进步给研究生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研究生教育本身也必须提供对未来工作性质持续变革的适应能力。世界各国只有进行更广泛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重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工作,培育面向 21 世纪的研究生。未来世界是不可知的,是充满动荡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应该反思,对于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我们应该如何培养研究生的高级学习能力,应该为研究生提供何种能力与价值,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拥有应对未来挑战能力的人才。面向未来的高层次卓越人才应该具有引领未来思想、国际视野、独立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和批判式思维、发现和应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等等。多元化的社会呼唤多元化教育,多元化社会应该有多元化人才观。面向未来重塑研究生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有力促进学习者实现价值观、能力建设和学习方式的全面转变。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顺应历史的发展,才能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4. 研究生教育类型多样化

21 世纪欧洲的博士生教育改革是在“博洛尼亚进程”和“里斯本战略”的推动下进行的。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 Barbara M. Kehm 教授指出,欧洲博士生教育和训练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对知识的没有偏见的追求,新知识的生产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欧洲,人们将博士生称为“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都有了客观的增长^[3]。越来越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将不再留在学术界,而是在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就业。而对于博士生而言,仅限于学科范围内的研究教育和适应学术性教研工作的技能对于非学术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是远远不够的。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大力推进博士生教育改革,组织机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学习年限、导师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多样性。传统纯学术的博士生培养观念已经制约了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为了适应多样化社会发展需求,欧洲博士生教育供给出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学位,相继涌现出课程类博士学位(Taught Doctorate)、论著类哲学博士学位(PhD by Published work)、硕博连读学位(New Route PhD)、基于实践的博士学位(Practic-Based Doctorate)等 9 种新型博士学位。欧洲博士生教育供给多样化改革一方面是受到市场力量的大力推动,另一方面是欧洲政府相关政策引导的结果。

5. 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于 1952 年首次提出。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首届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中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观念将会对高等教育教学的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4]。在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研究生教育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学生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关注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需求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博士生成功的关键。香港大学的 Hugo Horta 教授关注的是在博士生教育过程中,博士生对导师的专业满意度和个人满意度如何,影响因素是什么。Hugo Horta 教授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中国香港和韩国的两所公立大学的调查发现:具有创造性思维模式的博士生对导师的专业满意度更高;博士生对定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以及拥有强大国际研究网络的导师的专业满意度更高;博士生与导师的见面交流频率越高,其对导师的个人和专业满意度越高;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越多,博士生的个人满意度越低。清华大学的 Hamish Coates 教授认为在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倾听学生的声音,关注博士生的求学经历和就读体验,从而更好地进行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 Brian P. McCall 教授关注的是博士生的劳动力市场变化,通过对 1998—2017 年美国博士生培养与就业情况的数据分析,剖析了美国博士生劳动力市场变化及不平等加剧的内在动因,发现过去 20 年间,美国博士生人数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同时美国平均薪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薪资水平却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且性别差异较大。

三、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

1. 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有保证但有待提升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作了题为“以高水平研究支撑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新发展”的主旨报告。洪司长在报告中指出,70 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在摸索中前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数百万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高端引领与战略支撑作用。1949 年,我国的研究生招生数仅为 242

人,研究生毕业数仅为107人,研究生在学数仅为629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当年招收研究生10708人^[5],到2018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达到273.1万人^[6],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育大国。在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完善的同时,研究生教育质量得到了保证。我国实行学位论文抽检制度,教育部委托专门机构每年组织专家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为10%,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达96.2%,但也有3.8%的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一定问题。从整体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政府主导,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最基本的特点;二是二元制,二元是指我国研究生教育有两个教育主体,即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三是快速发展;四是实践创新;五是学术导向。清华大学教授Hamish Coates提出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促使我们必须反思博士生教育的基本原则,在增加培养规模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培养质量,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2. 研究生教育从重管理到重培养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瞿振元教授指出,过去40多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研究生教育的战略地位逐渐确立并不断提高。在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研究生教育。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李军教授从宏观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来反思中国大学的发展轨迹,在普及化阶段,中国大学3.0版至少有四个核心价值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即院校自主、思想自由、知行合一的人文使命以及和而不同的多元性。过去40多年,我们在注重规模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质量,但是这种质量的保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加强管理来实现的,例如从改革学制、中期考核、论文盲审,到国务院学位办组织论文抽检,都是从管理的角度来提高或者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思考从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角度做了多少?研究生是劳动力,科研的生力军,还是培养对象?无论是从研究生教育本身的定位,还是从心理学心智成熟理论出发,我们都要将研究生作为培养对象来看待,只有注重培养才能实现研究生教育完整培养目标,克服实际工作中重管

理轻培养的倾向。研究生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瞿振元教授认为我们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怎样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为了实现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我们要努力构建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统筹推进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建设。我们不仅要培养研究生具有专门知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还要培养研究生具有更加全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要重视价值观的养成。高校需要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带动其他工作的内在逻辑,增强人才培养工作定力,下大气力、苦功夫把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好。

3. 研究生教育结构不断优化,但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现象依然存在

结构决定质量,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将研究生规模结构更加合理作为首要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13个学科门类、111个一级学科,包括博士与硕士两个层次、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的研究生培养体系^[7]。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地区、校际、层次等结构上,体现在结构与需求不匹配上,不充分主要体现在整体质量还不够高^[8]。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从类型结构的角度出发,探求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背景、现状、困境以及优化路径。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推动,随着各行各业对高精尖复合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的增长,传统的学术学位博士生培养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无法满足社会和市场对科技成果转移和产业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学术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主要是为高校、科研单位培养学术人才,但是近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大量的学术学位博士毕业生没有进入学术机构,而是流入了非学术市场。第三是国际经验。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主要借鉴的是美国,美国具有多样化的专业博士类型,满足不同行业和领域的需求。在政策设计方面,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在招生对象、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等方面与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存在较大

差异,但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是类型不同。但调查研究发现,各方利益群体包括导师、博士生、研究生培养单位等均对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满意度较低。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改进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方案,促进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结构优化,突出专业学位的专业性和人才培养特色。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要与职业相挂钩,要让行业更多地介入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由高校配合,行业主导,考核标准由行业制定,从而保证专业性。其次,模式创新,打破“产教壁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专业学位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过程。

4. 重视研究生教育研究,推动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了由大到强的新时代。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题就是由大到强、由强到优。为此,迫切需要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研究成果,来支撑、引导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研究生教育走过了一个不断探索、试验创新的时代,将要进入更加注重系统设计、科学规划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加强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就显得愈发重要。新时期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研究视角。一是要把研究生教育自身的体系理清楚,把体系内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理清楚。研究生教育研究要有系统的观点,要重视研究生教育体系内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要把研究生教育放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看。整个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再到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相互连接和贯通的体系。三是要把研究生教育放在社会体系中去。教育系统不是封闭的系统,教育始终是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我们要始终着眼于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发展研究生教育。要精准识别社会需求,根据社会的需求来改革研究生教育的供给,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四是要把研究生教育放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看。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孤立存在的,各国教育的交流、开放、

合作日益频繁、深入,或者正在形成新的教育体系。所以我们要在国际体系中看待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重视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四、启示

本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与讨论,展现了“双一流”建设、21世纪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以及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放眼世界,现代化强国都是研究生教育强国,世界一流大学均具有一流的研究生培养实力,均以培养一流的研究生为重要标志和旗帜。研究生教育越发达,高端人才供给就越充分,科教融合就越紧密,科研育人机制就越完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就越成熟。没有强大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没有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供给^[9]。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把握世界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借鉴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成功经验,加快内涵式发展,使我国由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同时我们要加强理论研究,以高水平的研究支撑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电子教育, 2018(2): 1.
- [2] 顾明远.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验[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 26-34.
- [3] 科姆. 博士生教育去向何方?——全球变化背景下欧洲的新举措[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4): 66-74, 185.
- [4] 刘献君. 论“以学生为中心”[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8): 1-6.
- [5] 梁桂芝, 孟汇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要事志(1949. 10—1993. 3)[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4: 187.
- [6] 王战军, 张微. 70年探索奋斗: 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与启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9): 43-48.
- [7] 王战军, 乔刚.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成就与展望[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12): 7-13.
- [8] 杜占元. 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 推动内涵发展再上新台阶[EB/OL]. http://www.moe.gov.cn/s78/A22/moe_847/201804/t20180417_333427.html.
- [9] 黄宝印, 王顶明. 继往开来, 坚定自信, 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纪念研究生教育恢复招生40周年[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1): 3-7.

(责任编辑 贺随波)